

文集

遼寧省
丹東
本溪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

· 1985 ·



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在本溪开幕
本溪市文化局付局长郑家林主持了开幕式



本溪市付市长王玉兰致开幕词



会议就辽东新旧石器文化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到庙后山遗址考察



进行大会交流

目 录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的贺信	(1)
本溪市副市长王玉兰为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致开幕词	(2)
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在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上的总结讲话	(3)

※ ※ ※

辽西文明的起源	林一璞 (6)
考古文化与民族共同体	孙进己 (9)
略谈西团山文化及其与辽东青铜文化的异同	董学增 (12)
集安文物考古述略	张雪岩 (16)

※ ※ ※

可比较的中日远古文明	林一璞 (19)
华东地区最古陶片	李知宴 林一璞 (32)
新乐文化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黎家芳 (37)
河北龙山文化初探	罗 平 (42)
环形器与研磨轮	宋兆麟 (46)
试海西团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性质	董学增 (58)
辽东地区原始文化概要	付仁义 王连春 刘兴林 (63)
营口金牛山人骨化石	崔德文 (71)
太子河流域洞穴(裂隙)堆积物地质特征与地理环境	高尚华 (75)
本溪庙后山三门马的特点及其年代的初探	许振宏 (79)
丹东地区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分布	付仁义 崔 王传普 崔玉宽 (82)
前阳洞穴遗址发掘简报	王连春 崔双来 (84)
辽宁丹东地区内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化石的发现	林一璞 张振洪 付仁义 王连春 (91)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初期辽东半岛黄海沿岸的海侵	许玉林 (96)
丹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点认识	高青山 (104)
后洼遗址	许玉林 (106)
丹东地区鸭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	许玉林 金石柱 (111)
浅谈太子河上游新石器文化	齐 俊 (116)
简述本溪地区春秋前的人类历史	刘兴林 (120)

辽东地区青铜文化浅论·····	武家昌	(124)
丹东地区出土的青铜短剑·····	王连春 许玉林	(126)
辽宁本溪发现青铜短剑墓·····	魏海波	(129)
辽东地区燕秦汉文化与古长城考·····	冯永谦	(132)
西汉武次县方位考·····	王连春 崔玉宽	(137)
纥升骨城初探·····	郭俊武	(140)
高句丽早期平原城—下古城子·····	苏长青	(143)
浅谈岫岩发现一批金代窖藏瓷器·····	杨永芳	(145)
本溪地区发现金代官印·····	管兆信	(147)
大鹿岛沉船概述·····	关仁良 王传璞	(151)
略谈宽甸境内的明代墩台·····	金石柱	(153)
从本溪发现的《马佳氏族谱》看清王朝建立前后的征招政策·····	陈德辉	(151)
红山文化玉雕艺术初析·····	李恭笃 高美璇	(158)
概述建国以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	李宇峰	(164)
辽宁兴城发现元代东溟和尚高潮的寿塔铭·····	戴元立	(169)
谈文物中的龙和龟·····	王洪滨	(17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 大会秘书处：

欣悉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于近期召开，谨向大会主席团和全体代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今后在考古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原想参加此次盛会，从学术讨论中可以吸取许多新的知识。遗憾的是，最近由于工作比较紧张的关系，心脏不大好，遵医嘱，需要观察一个时期，暂时不会外出旅行。

辽宁省在考古学上的位置很重，因为它是和邻邦远古文化交流的桥梁。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已作出重大贡献，为祖国学术界增添了光彩。我相仗与会同志多数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科学家，比我们年老的人有许多优越性，希望同志们同心协力，扬长避短，共攀科学高峰。我虽已年越古稀，但为贵省的考古事业仍愿增砖填瓦，有需要我的地方，请示知，愿出一臂之力。

祝大会圆满成功！祝诸位代表身体健康！

贾兰坡

1984年6月30日

本溪市委副书记王玉兰

为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 学术讨论会致开幕词

同志们：

辽宁省暨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今天开幕了。首先，我代表本溪市人民政府向来自北京、河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以及省内各市地的考古专家、学者、考古工作者表示热烈欢迎！

大家知道，我国是个历史悠久，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国家，地上地下文物极为丰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地见证。也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所做地重大贡献的光辉记录。就我们市而言，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市博物馆从事考古的同志和县区文物干部，对我市城乡历史文物进行了普查，共发现文物古迹四百五十多处。其中古城址九十五处，古墓葬五十一处，古文化遗址七十五处，并发掘、征集了大量的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青铜时期，乃至各代珍贵文物。这些先人的遗址遗物是我国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是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贾兰坡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林一朴同志，地质研究所周昆叔同志等，曾多次来本溪考察指导，对庙后山古人类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和开发。经过贾老和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测定，得出了可靠的结论。断定早在三十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劳动、生息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化。庙后山古文化遗址，以及丹东的前阳和后洼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无疑都是东北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人类起源、分布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等都有重大意义。

几年来，从事考古工作的同志不计较条件，不畏艰苦，克服了很多困难，默默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对历史文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写出了一批论文。这些论文便是我们这次考古学术讨论会讨论的基础。今天大家在这里交流经验，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共同探讨，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人们面对这些凝记着我们祖先智慧和血汗的珍贵文物时，就可以大大地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产生强烈地爱国主义感情，鼓舞人们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斗争中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

我们本溪的考古工作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几年来我们得到国家、省里、河北、天津、吉林、黑龙江，以及省内各市地的专家，专业人员的很多帮助，支持和指教，我代表本溪市政府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同志们，党和国家把发掘、研究、搜集历史文物的重任托付给我们，我们文物战线上的每一位同志都感到骄傲，感到光荣，大家怀着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

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

在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 会上的总结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这次辽宁省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在本溪市、丹东市党政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两市文物部门同志和各位到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在来自外省市专家和来自省内各市地及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前后经过一周时间，现在就要结束了。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别开生面，开得圆满成功，开得朝气蓬勃。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极其热烈的气氛。以我看来，这次讨论会的尾声十分有力、特别动人，大家想要阐明和争论的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刻，这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悬念——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省厅对这个学术讨论会很重视，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个会议的经验。根据会议的具体情况和不少同志的议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会有不少新的特点，我很赞同，想从四个方面谈一下看法。

一、新 形 势

这次考古学术讨论会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也是在全国范围的文物考古事业欣欣向荣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八二年五届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后，把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和国家政府从各个方面都给予我们的事业以极大的支持，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新成果的根本保证。

我们辽宁省从一九七九年朝阳地区文物普查试点之后，迅速地在全省掀起了文物普

责任感，都在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希望大家在学术讨论中，勇于探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把这次会开好。通过这次会把我们本溪、丹东地区的考古研究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到会的各兄弟市的同志们，给我们本溪的考古工作多多留下宝贵意见。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圆满成功！

查的新高潮，几乎成了全省人民共知的事情，这在我省是空前的。几年来的文物大普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象全省成千上万个古文化遗址点，通过普查发现后，一古脑儿地摆在我们面前，怎样对待呢，如何认识呢，我们的考古技术如何呢，怎样解决一些重大发现呢，总之，形势喜人，压力不小，这就不仅仅是单靠几个专家即可解决的事情，而是必须要有相当一些人力、要有极其科学的方法才能完成的任务，正是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新形势之下，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应运而生了。

二、新 方 法

面对全省文物普查遍地开花的新形势，如果继续施行朝阳试点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无论从财力上或从人力和时间上都是不行的。正当此时，本溪和丹东两市的文物考古部门主动联合，提出召开两个地区合开的考古学术讨论会，并邀请省内外专家到会指导，以求即迅速又较准确地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这个意见很快受到省厅的重视和支持，并帮助他们进行了充分的筹备工作，决定利用这个新的方法探求一下解决我省问题的路子。

大家知道，我省过去一贯把辽西、辽南等地放在全省工作的重点上，而辽东则是领导的薄弱环节。实际上，近些年来，辽东地区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考古队伍的成长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大力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不少十分重要的古代人类遗址相继发现。这些发现如果都坐等上级派专家去解决，这就要贻误战机，损失要大。本溪丹东两个地区决定联合开会讨论两地的主要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方法。这样，可以基本上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把问题端出来研究，经过大家的讨论、鉴别，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质量就好多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实践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是很好的。我们全省各地如果都能这么做，那么我们面前的问题就会在最快的时间内被个个击破。这个新的方法要给予肯定，希望各市地也应当开这样的讨论会，今后我们就是要把双脚迈向各市地，继续支持这样的学术讨论会。

三、新 成 果

这次学术讨论会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到会同志共同对本溪和丹东地区的几个重要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这些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分析鉴定，一些同志宣读了论文，并且征求了专家意见，对有些问题还摆在大会上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同志们集中精力讨论了庙后山和前阳这两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存，对后洼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这些对全国乃至世界考古界都将产生影响的文化遗存的认识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但也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有争论就有进步，认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不断实践的过程，不断的实践将使我们在这些学术上的意见分歧逐步趋向一致。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本溪丹东地区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为我们继续寻找东北山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古人类遗迹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省博物馆的孙守道同志大胆而果断地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广大考古工作者应当迈开双脚，大踏步地向北部山区进发，到那里去寻找古人类的遗迹。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学术讨论会期间，各地专家还为我们作了许多学术报告，使辽宁的同事们受益不浅，应当感谢他们。在会议期间，可以看出许多老同志宝刀不老，敢于亮观点，不少年

青同志后来居上，勇于谈意见。通过学习和交流，不但促进了本溪和丹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对全省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次学术讨论会对全省树立了一个样板。

四、新 任 务

本溪丹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我认为这只是拉开了辽东山区考古的序幕，更好更精采的节目还在等待着你们去排练，也就是说有更加艰巨的工作在等待着大家去做。庙后山人、前阳人这些极其重要古人类遗址，现在的研究成果还仅仅是个雏型，后洼遗址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一步。这些文化的研究，涉及着其自身的发展以及其与固邻的联系，很多深刻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做工作。要求本溪丹东地区的同志丝毫不要有松劲情绪，要继续努力工作，争取有更多的发现和更新的观点，把祖国东北边陲的考古事业搞得更加出色。

来自省内各市地的同志们：你们参加了这个大会，支持了这个大会，你们发表许多好的观点，你们还通过这次盛会，向别的同志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也是不小的。同时应当指出，你们身上所挑的担子也是很重的，因为你们地区的问题也一定不少，尚待尽早解决，希望你们回去后，认真研究实际问题，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全省的同志上下一条心，团结向前进，我们的文物考古事业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更加崭新的局面。

来自外省市的同志们，你们为这次学术讨论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的宝贵意见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我们辽宁的同志。希望你们今后不断地支持辽宁的工作，我们要互相支持，使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来个腾飞！

同志们，紧张而有成果的讨论会结束了。希望大家乘这次会议的东风，结合本地的实际，把各地的考古工作搞上去，把考古学术研究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全省的考古工作者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开展好文物考古事业，为了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上接第18页）

条件不可能修筑墓上建筑的人，在墓上放几块瓦象征着“冢上作屋”。

目前，国防公路的古墓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也许还有新的发现，那时再向同志们介绍。

附记：以上材料是1984年7月参加本溪丹东地区考古学术讨论会的发言提纲整理的，因没有参考资料，难勉有错误，引用时请正式发表的材料为好。

辽西文明的起源

林 一 璞

以林西、赤峰一带新石器时代遗物为代表的辽西地区远古文明，有可能是中国远古文明组成成份中的重要者；它的根源也许要向满洲里市札赉诺尔的11500年前的远古文明那里去追寻。

辽西，曾是古战场。诗人笔下故意不作正面描写，而是转弯抹角地写一个女子对梦的贪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她是多么向往辽西啊！

千真万确，辽西正在吸引着愈来愈多的考古工作者，就笔者说来，他从辽西古战场仿佛看到了中国文明的摇篮。

一、林西出产古陶片的层位

1930年10月间林西被发掘，梁思永发现它的砂丘是3层重叠的砂层构成。下层净黄砂，是更新期蒙古式的堆积。（原文如此）中层为黑砂，直呼它为“新石器层”亦无可，上层黄砂。在上层和下层的黄砂里无遗物的踪影。（抄自考古学专刊甲种五号195年梁思远考古论文集111页第4刊）

9

（1）原题目为《文明起源辽西东蒙说》

梁思永在黑砂层中部，下离更新期砂面0.5公尺水平处挖得素面灰色陶片1块，以及其余15件遗物（下文要谈到）。

发现古陶片当然使人鼓舞，但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古陶片能够证实哪些重要的事实。梁思永正确指出以下几桩：

（1）陶片与细石片是同时的。

（2）陶器最迟在黑砂层堆积的中期已通用。

（3）石砧、石锤、磨石等石器在黑砂层堆积的早期已通用。

（4）制作粗筒如龟形石片之石器直到黑砂层堆积快要完结时还在通用。

这个事实，从较早的层位里挖出古陶片来，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同样，它也在1975年9月初的札赉诺尔重演。从层位和陶器本身两方面它和林西者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时代上有早晚之分。

二、札赉诺尔出产古陶片的层位

下层灰白色粘土

中层 杂色砂砾…… 经 C^{14} 测定距今约11500年，含素面红色陶片及其它遗物
白砂

上层灰色亚砂土

林西下层黄净砂与札赉诺尔下层白粘土同属更新世，大于11500年；林西中层黑砂

与札赉诺尔白砂及杂色砂砾同属全新世，从11500年开始。11500年被笔者定为更新世与全新世的分界线。

在此所能禀告读者的是：

(1) 陶片、细石器与猛犸象披毛犀化石是同时的。比梁思永所见，条件多了一些，说服力强了一些。

(2) 陶片在11500年前已经通用，肯定早了林西古陶片的年龄。

(3) 石砧、石锤、磨石在札赉诺尔未尝得见，无可奉告其年代。

(4) 制作粗简之石片石器，通用时间很长，不能指望这些长期不退出历史午台的遗老去定时代而要指望新生的事物陶片。

三、林西、札赉诺尔古陶片的年代

林西，估计八、九千年，迄今无数据可引用。

札赉诺尔 11500年前 所测的木质标本系笔者提供的，层位可靠。

四、林西、札赉诺尔文化的继承

除古陶片外，林西1930年出土以下15件遗物：中孔石锤1件；磨石碎块2件；龟形石片1件；大细石片制凹刮器1件；大石片、石锥、石砧、磨石碎块等10件。

除古陶片外，札赉诺尔自1961年迄今在11500年前层位出土了不少遗物。

本文似将林西部份遗物与札赉诺尔部份遗物加以对比，以寻找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请勿把林西误为札赉诺尔，此事不幸已发生，见附录

中孔石锤（重石、环形器皆同物异名）1930年梁思永得自林西黑砂层最下部，发现时原位未动半埋黑砂中。1982年7月1日笔者采自札赉诺尔11500年层位。后者与前者都有残缺，大小和形状二者无大差别。这两件遗物的出现，使笔者把原来的看待中孔石锤年代较晚的观点改了，其中有的中孔石锤年代是较早，这两件属之，早到更新世刚结束全新世刚开始。难得的是三十年代的初叶梁思永就有这种卓见。七十年代末叶一些到非洲去的实地考古家就承认了这一见地。但国内仍有不乏持异议者，因为彼之所见尽是晚期的中孔石锤，有此致之。故笔者认为人各有看法不可勉强别人同意己见，可以保留的。

磨石，林西1930年出土了10多件，虽没有年龄数据但借助于同层中有中孔石锤出土，因其与札赉诺尔中孔石锤可比，有鉴于后者的层位属于11500年之故，目前暂定林西磨石年龄为11500年，似未偿不可。近得非洲尼罗河流域有关磨石年龄的资料两则如下：

$$14550 \pm 490 \quad b \cdot p(xsu - 3150);$$

$$13560 \pm 120 \quad b \cdot p(Y - 1447);$$

有据此，磨石固有年代很晚者，然其年代早者如斯，似亦不能否认。札赉诺尔磨石，笔者未曾采得，勿去认它。

古陶片年代，在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中部有早至 8050 ± 180 (uw-87) 或 8100 ± 130 (MC-484) 者，相比之下，我国能举出哪些陶片是8000年前？

至于日本古陶片年代则更早，遇一万年，安志敏撰文称其偏高，有不信之意，笔者鉴于在日本，与古陶片同出有一种细石器，近方形，两侧缘加工，是交错的，既然札赉

诺尔11500年前层位里出土了与日本可比的古陶片和细石器。笔者深信札赉诺尔古陶片的年龄，它是无可置疑的，于是他也相信日本的古陶片应当有一万年以上的，同意了人们用各种方法测定其陶片的年龄。

六、中国文明的起源

就是孰非有待揭晓：究是中国压根儿无这个一万年以上文明呢？还是有，至今未发现？抑或已发现的一万年以上的文明不被接受？是假的，证明不足的？要不要去揭穿它？

附录

在《中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初探》(2)一文的图版I的图5和图版II的图9上,读者可以看到原作者的说明是:5、札赉诺尔(新石器时代);

且不去细究括号内新石器时代这一鉴定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这不是笔者本文的主要意图，但笔者的确被事实所迫不得已在此指出，该图版上所谓的札贻诺尔石核，竟然不是出自札贻诺尔，而是出自于林西。

(1) 林西1924年5月24日石器保存于本所。

考古文化与民族共同体

孙 进 己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习惯于把属于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特点的考古遗存划分为一些考古文化类型，但划分的方法不尽一致，过去大都全要依据一、二种典型器物作为划分标志，如过去提出的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细石器文化等。近年则倾向于要具有一定的典型器物群，才能划分确定为一个考古文化类型。对一些考古文化类型的划分，比以前逐步精确，每种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也随之而逐渐缩小。这表明了对考古文化研究的深入。从东北来说，大部分已经提出的考古文化类型都属后者。但也有些文化类型的含义不够明确，如同仁文化、西团山文化，在有些同志的使用中，往往过于扩大，把一些仅在某种典型器物上相同的，但具有自己特点的别文化类型，也归入到这些文化之中。这反映我们研究得不够深入，还存在一些空白点，没有把这些文化典型同我们已知的一些文化类型区别开来。

一定考古文化类型的形成，并非偶然的，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面貌的具体体现。每一个考古文化类型大体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体。

既往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认识比较模糊，不少学者误以为很多民族都是自古以来就相当庞大。但近年由于民族史及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扩大的。最早的民族共同体仅是包括几个氏族，大约数百人至一、二千人的一个部落，以后才逐渐发展形成一些具有系属关系的部落群，并由这些部落群，结成一些部落联盟。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些部落联盟逐渐凝结成最初的民族（前资本主义的民族或称部族）。这些民族最初人数也不多，仅几万人，以后才逐渐融合了许多部落和民族，扩大形成一些较大的民族。

民族共同体的这一发展过程和不同时期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最早出现的一些考古文化类型分布范围都比较小。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逐渐扩大，到金属时代更出现了一些分布比较宽广的文化类型。

过去所以把一些新石器文化类型划得比较宽广，主要是因为注意了它们间的共性，具有一些共同的典型器物，而忽视它们之间还有个性、在其他很多方面还存在许多区别。如果细加划分，实际上还可分为许多个文化类型。

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常产生一些变异。有些变异不大，基本上承袭了固有文化，仅是出现了一些体现新生产力的新器物，或是出现了少量邻近地区的器物，或是在某些制作方法上有了局部的变异。这通常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经济文化发展和其他各族交往的结果。这种差异，可以看作同一文化类型的阶级差异，而形成这一类型的分期。但有些地区，不同时期的考古文化类型差异很大，在很多方面都和固有文化有很大区别。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考古文化类型。或者虽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固有文化的

特征，但基本面貌已变了。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民族迁徙所产生的。原有的民族迁走了，新来的民族带来了新的文化，或者是由于新的民族迁来和旧的民族杂居，这就产生了文化的混合和过渡。因此在研究一个地区的考古文化系列和分期时，必须区别究竟是固有文化的发展变化，还是新文化的移入。属于后一种情况时，就应命名为两种文化类型，而不应作为同一文化类型的不同阶级。例如目前对夏家店文化上层和下层，大都认为有较大区别，反映两个民族的文化。这样最好分别命名，而不作为同一文化的两期。

一定的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和相应的民族共同体的分布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民族的不断迁徙，互相交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征服、互相杂居。这时，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似乎和民族的分布有了差异。在这一民族活动的基本地区之外，也常发现代表这一民族的考古文化，出现这种情况时，不能简单的根据一些异质就否认考古文化和民族分布的一致性，而应具体探索是由于民族迁徙杂居造成，还是民族间互相交往传播造成。往往细加探究，都会找到一些线索。

每个考古文化类型的文化内涵，大体上都反映了某一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它的习俗特点。当然，其中有些方面是反映一定地理环境、一定经济类型。这些文化内涵，如果认真和其他文化类型比较，就可发现它往往不代表这一文化类型的个性，而是反映了若干文化类型的共性。

由于考古文化类型和民族共同体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考古工作者在确定某一考古文化类型时就不能不同时考虑到这一文化类型究竟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要确定这一考古文化类型的族属。考古文化族属的确定涉及到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如何为历史服务的问题。弄不清这些考古文化的族属，就无法应用这些考古资料研究历史。因此，考古文化族属的研究是考古学界的关键性课题。

既往历史学者研究历史，主要依据文献史料，顶多使用了一些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对大量实物资料使用很少，这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于正确说明。尤其是一些边疆民族史，文献资料很少，更不能不依靠于考古资料，必须使用考古发现的大量实物资料，以说明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社会性质、文化面貌、种族特征、和其他各族经济文化交往的状况。但如果不解决考古文化的族属问题，则资料虽多无法使用。

考古文化族属问题，不仅涉及新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也涉及到较晚的金属时代。例如，我们通常说这是辽金时期的文化，那是隋唐时期的文化，但在这些时期，并不仅是一个族，而往往是有很多民族交借杂居。如隋唐时期的辽宁，就居住有高句丽族、契丹族、汉族；辽金时期的辽宁，除以上三族外，还有渤海族、女真族、奚族、室韦族居住在今辽宁。这些民族交错杂居、经济发展又很不一致、文化面貌也各有特征。因此，在辽宁地区发现一些文物后，仅确定它属那个时期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确定它的族属。因此，考古文化族属的确定，是涉及整个历史时期的重大课题。

要确定各考古文化类型的族属，是一件艰苦的工作。简单的比附只能形成一些初步的设想，而无法成为一些科学论断。要完成这一工作，似应从下述一些方面着手。

首先，考古工作者必须把现有各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及存在时间进一步搞清楚。在这里要特别注意既往确定的各考古文化类型是否都是单一的文化类型，还是实际上其中还可划分出许多个文化类型。这样才能正确确定每个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

同时，所谓一个考古文化类型的分布范围，决不等于其中某个典型器物的分布范围，后者往往要比前者大得多。

在确定各个文化类型时间的上下限时，单靠类型学的排比推定是不可靠的，有些器型可以残留很长时间。

必须有 C_{14} 等比较科学的年代数据。同时，必须注意这一考古文化类型发展中的变异。如果变异较大，实际上已属另一种文化类型，就不能把另一文化类型存在的时间，看作这一文化类型存在的时间。

同时，民族史及历史地理工作者应该根据文献将历代各民族共同体的分布范围及存在时间弄清楚。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时间及空间的统一，即要考虑到一个族的分布范围时，必须相应确定它走什么时间分布在这里。因为，很多民族不断在迁徙中，它在不同时间的分布范围是不同的。此外，由于旧史家的错误认识，常把许多个相邻的民族共同体，看作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对它分布范围的认识就发生了误差。如过去对肃慎、拖类、勿吉总看作是一个族，因此把它他的范围都扩得很大。实际上，它们是同一族系的不同部落，各部的分布范围是不一致的。都必须具体加以区分。

有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对比，就能对各考古文化的族属作出初步的判定。

其次，考古工作者要将各考古文化类型的文化内涵弄清。确定这一文化类型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民俗特点。这里要防止把若干考古文化类型共有的，看作某一文化类型所特有的，因而产生判断上的误差。

同时，民族史工作者和民俗工作者要根据文献，尽可能地确定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及每个阶段的特点，确定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各方面习俗的特点。这里同样要防止把各族的共性看作某族的个性，或把不同时期的习俗看作同一时期的。

有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研究就可以进一步判定这一考古文化的族属。

第三、考古工作者应把各文化类型中发现的古人骨进行测定，判定它们的种族类型。

而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则应根据已有成果，将有关各族的种族谱系提出一个初步意见。并提出各种族类型集团的大致体质特征，提供一些判别的参考数据。

有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对比，就能对各考古文化类型所反映的人们种族划分有一定认识。为确定考古文化族属提供更多依据。

第四、将以上三方面的成果进行综合比较，再参考古代各族语系的分布图。如果大体上几方面的判断都比较一致，则这一考古文化类型的族属大致可以认定了。但如果某一方面的判断和其它方面的判断出入很大，就应重新检验已经做过的工作。是否其中某一方面的结论存在误差。在这里，决不能简单地接受前人某一方面或是肯定或是否定的判断。对任何前人的结论，包括一些权威的结论，都必须重新检验其所作结论，论据是否充足，推理过程是否科学。只要发生疑点，就必须认真加以探讨，而不能回避。

第五、要将相邻区的各考古文化类型及其族属作统一排比。有时，从局部看来，我们对某一考古文化类型族属的判定是正确的。但综合排比结果，和其他结论却相矛盾，或者同一时期的同一族有了两种不同的考古文化，或者同一考古文化有了两种不同的族属，或者发现了空白地区，或者发现了重叠现象。这都要求对整个工作再作重新检查，

略谈西团山文化及其与辽东地区 青铜文化的异同

董 学 增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朱贵同志一定要我在大会上讲一讲，推卸不了，只好从命。在坐的有我的老师，有许多知名的学者，我的讲话谈不到专家讲学，只是将我们地区在西团山文化考古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自己在西团山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粗浅体会，向大家概括的汇报一下，请老师和同志们批评指教。讲题是：“略谈西团山文化及与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异同”。

一、西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状况

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者三上次男和我国考古学者李文信等，曾在吉林市西郊的西团山进行了考古调查，并有报告发表。四十年代初，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佟柱臣先生也在这里作过考古调查。1948年吉林解放，同年9、10月间，原东北大学教授杨公骥带学生在这里进行了首次清理发掘。1949年7、8月间，他们又在此

直至摆平为止。

因此，确定考古文化的族属，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各地区各学科学者共同作长期努力，需要从事这一课题的学者既作微观的研究又作宏观的研究。

在开始时，可能每一局部的研究都论据不足，难以定论。但经过综合对比，却能逐步肯定下来。在这里我们不能用简单的算术方法，从若干已知数运算得一结果。而是要用代数的方法，从若干未知数去运算得出结果。这就需要从不同的方面构成许多个方程。当仅从某一方面考虑时，好象答案有许多个，无法定论。但若干方面综合起来时，有许多答案大适应某一方面，不适应其他方面，相继被否定了，最后就逐渐找出了唯一的正确答案。

第六、确定考古文化的族属要从晚期逐步到早期，而不要一开始就从早期的新石器文化各类型的族属着手。因为，越往前文献资料越少、越往后文献资料越多。脱离了文献资料来研究族属是很困难的。只有先对照周秦以后的文献，确定了文献中记载的各族的考古文化后，才能进一步上推，确定这些族先人的考古文化类型，因此最好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文化的族属下手。

目前，东北地区关心考古文化族属的同志越来越多了，大家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协作关系。相信，经过大家三、五年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在这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

山进行过第二次发掘。1950年9月，以裴文中教授为团长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在这里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事后，由佟柱臣先生执笔，以东北考古发掘团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报告。在报告中正式提出以西团山墓葬遗存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为“西团山文化”的建议，现已被考古界所承认。这就是西团山的发掘与“西团山文化”的命名。

继西团山发掘之后，对西团山文化遗存先后进行二十几处清理、发掘工作，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53年吉林市江北土城子石棺墓和居住址的发掘，1957年到1962年吉林市郊长蛇山居住址和墓葬的发掘，1973到1978年永吉县星星哨水库石棺墓的发掘，1976年到1980年吉林市郊猴石山居住址与石棺墓的发掘，1979年到1981年永吉县杨屯大海猛居住址和墓葬的发掘，1980年和1981年舒兰黄鱼圈珠山居住址和墓葬的发掘。截至目前，已发现西团山文化遗址和墓地达200处左右。

据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西团山文化报告、论文、著作，统计将近50篇（部）左右，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吉林江北土城子石棺墓及古遗址发掘报告》、《吉林市郊古代文化的三种类型》、《试谈西团山文化的晚期遗存》、《试论吉林地区的西团山文化》等此外，三上次男的《满鲜石棺墓文化的研究》、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朝鲜考古学概要》两本大部头的著作中也有相关的内容。

在西团山文化研究中已经解决和正在探讨的问题有：

1、文化性质已由过去误定的新石器时代转变为青铜时代。

2、分布地域：从吉林市郊扩大到吉林地外五县，进而又扩大到长青地区、四平地区，近年来又扩大到铁岭地区和抚顺地区（虽然文化面貌与吉林地区不尽相同，但似应属西团山文化的一个类型）。从现有考古资料看，这一文化的东边以张广才岭为界，西边到伊通河，南边到辽河上游和綏清二河上、中游，北止拉林河右岸。

3、历史断限与文化编年：由原来《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所推定的上限相当于春秋、下限到战国的认识，改变为上限自西周初、下限到秦汉之交。在文化编年上，最初只知道西团山文化几个遗址的相对早晚关系如西团山早于骚达沟，骚达沟早于土城子，但还没有找到它们在发展中的具体差异，更没有碳₁₄测定数据作为参考，近年来初步建立了吉林地区西团山文化主要遗址的编年：西团山相当于西周初到西周末，星星哨相当于西周初到春秋早，猴石山相当于春秋中到战国中，长蛇山相当于战国中，土城子相当于我国晚到秦汉之际，杨屯大海猛相当于秦汉之际。同时，初步认识了早、中、晚期文化遗存的基本特征。

4、对西团山文化所反映的经济形态、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埋葬习俗的认识更加具体了，并有专文和专著论述。

5、对西团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性质，由原来笼统地认为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现在有人依据考古材料所揭示的“劳动和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提出了父系氏族社会早、中、晚期的意见。

6、对西团山文化主人的种属问题，1963年第2期《考古学报》《西团山人骨研究报告》认为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通古斯族，最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骚达沟人骨测定，认为属于西伯利亚蒙古种。